

一 历史背景

侵吞中国，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日本侵略者自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之后，本着蚕食中国，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①。1933 年 1 月开始，日军将侵略战火引向长城及其内外，就是它从局部战争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由它的既定国策和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所决定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军事负担的加重，中国、美国等排斥日货运动的高涨，使其对外贸易剧减，价格惨落，工厂继续停工减产，失业人数激增。到 1932 年底，其经济恐慌进入到一个新的更尖锐的危险境界。这种经济方面的危机，使得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1932 年一年，工人斗争竟达 3400 余次，人数达 16.8 万多人；农民斗争仅九一八后半年内就爆发 1500 次以上，均超过历史上最高记录，而且斗争的性质开始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面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

以及“各国及国际联盟对帝国对外政策每每作梗”^①，引起政权的连续更迭。1931年12月11日，以民政党总裁若村礼次郎为首的民政党内阁在强硬派的威逼下宣告辞职，接着建立起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为首的新内阁，由荒木贞夫担任陆军大臣。尽管犬养内阁在侵略中国和处理满蒙问题上“支持军部的主张，采取积极政策”^②，但他主张“不使日本政治专由陆军来支配”^③，仍不能适应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法西斯势力的需要，不到半年，就发生了第一次有关军人刺杀首相的恐怖暴行事件。1932年5月15日，海军中尉古贺清志等17人，携武器袭击内阁总理大臣官邸及其他地方，向各处投掷手榴弹，犬养毅中弹负伤终至死亡。5月26日，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建立起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法西斯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继续担任陆相，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出任外相，标志着政党内阁的结束。随后，日本关东军首脑部改组，武藤信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冈村宁次任正副参谋长，法西斯皇道派另一首脑真崎甚三郎担任中央军部参谋次长，使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力量大为增强；自此之后的日本政治，便转向于任凭军部专横暴虐的途径”^④，这就为加深与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从争夺殖民地战争中寻找出路，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基本原因。

①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第29页，中华书局，1981年内部版。

②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第29页。

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④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4）第191页，台《中央日报》译印，1986年版。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中国，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由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东北满蒙建立一个伪政权的初步方案。九一八事变后的第 4 天，三宅参谋长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在沈阳馆召集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商讨统治东北的方案。土肥原主张“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提出“趁此机会一举解决南北满洲问题，根据过去研究的‘占领地维持方案’的宗旨，将全满做为我国领土予以统辖占领”；石原除赞同“一举解决南北满洲”外，对于占领的方式提出“必须考虑中国民心的向背以及国内外形势”^①。根据讨论，确定在日本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②。很显然，他们所要建立的伪政权，其地域广及热河省及察哈尔、绥远境内的蒙地。9 月 30 日，陆军中央部通过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之方针》，决定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建立独立政权，由日本操纵。由此，10 月 8 日召开的日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了《处理时局方案》，规定“满蒙问题拟同将在满洲建立的、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新政权进行交涉，以求根本性解决。”^③

但是，关东军对陆军中央部建立亲日的独立政权方案并不完全赞同，他们认为只有建立“独立国”才利于日本的控制。关东军司令部经委托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向日本政府及陆军中央部游说，使建立“独立国”的主张为日本政府和陆军中

①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土肥原秘录》第 11 页，中华书局，1980 年版。

② 同上。

③ 〔日〕《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篇》。

央部所默受。10月24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其目的“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管理，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①。随后，经进一步谋划，于11月17日起草了《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除有关所谓“自由国”的政体、行政区划外，还明确规定了“国防由帝国负责”^②。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携带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到东京。板垣向陆相荒木报告说：“满洲的大势所趋，是建立独立国家，曾经探询重要人士及实力分子的意向，都是如此。”^③1月6日，即由陆军、海军和外务省的有关官员决定了《中国问题的处理方针纲要》，其中规定：（一）通过日本帝国的威力，使满蒙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等各方面成为日本永远存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二）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逐步引导其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形态。（三）满蒙的国防由日本负责，将该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伪国的形式是采取由汉奸出面，先建立地域性的伪组织和伪政权，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权，逐步走向联省自治，待时机成熟，宣布建立伪国。由此，在日本侵略军的扶植下，先后在各地建起了各式伪组织和伪政权。同时，根据建立伪国的方案，派遣土肥原往天津，策动清废帝溥仪到东北充当傀儡。土肥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完

① [日]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32页

② 同上，第248页。

③ [日]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4）第176页。

成了溥仪出走工作”^①。关东军即为建立伪国加快步伐。1932年2月16日至17日，召集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黑龙江省长张景惠等人策划，决定于3月1日前完成建立伪国的各项准备，并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2月18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②。2月25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伪国建国通电，宣称：“本会成立后，筹议东北各省区及蒙古区域建设新国家事项，兹议定新国家之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国旗用新五色旗，首都定长春。”^③3月1日再发所谓“建国宣言”，妄言“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谋树立（自）立，应即以三千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④3月9日，溥仪粉墨登场，在长春举行就任典礼。

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炮制的伪满洲国，既是割裂中国领土，稳固它对东三省的统治，加深殖民掠夺的产物，也是为扩大对华侵略的一项重要准备。在他们制定的各种方案中，公然将热河省及东三省以外的其他满蒙地区划入伪满版图，这也成为他们扩大侵略的一个借口。长城的烽火，遂由此而燃起。

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制造伪满洲国以后，便加紧建立殖民统治秩序，从国内调遣大批兵力，对活跃在东三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讨伐”，以解除扩大对华北侵略的后顾之忧。

① 《土肥原秘录》第13页。

②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695—70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伪东北行政委员会通电》，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695—705页。

具有反抗外国侵略传统的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目睹侵略者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蹂躏我男女同胞，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激起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他们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准抵抗的命令，自发地掀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几个月内，组织起有 30 多万人参加的各种名义的抗日义勇军，用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攻打城池，扰乱敌人后方，破坏交通，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日本侵略者炮制的伪满洲国出笼后，各地义勇军更是同仇敌忾，就在 1932 年 3 月，吉林国民救国军接连奇袭海林车站，开展墙缝伏击战和南湖阻击战，毙敌小川大尉、山谷支队长以下官兵 3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4 月，李杜、冯占海等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分三路进军攻打哈尔滨，阿城一役，击毙日军 150 余人，伪军 400 余人，并争取伪军一个团反正。6 月挥师南下，收复榆林。7 月连克五常、舒兰，并进攻省城吉林。辽南各部义勇军于 8 月下旬对日伪统治中心沈阳发起攻击，占领东塔机场，烧毁油库，“在飞机场一隅押收飞机之仓库发火，结果内中押收飞机，竟尔烧失”^①。攻打沈阳的战斗，不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成果，而在政治上也产生深远影响。10 月，邓铁梅、苗可秀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与刘景文等部义军攻打大孤山（今属东沟县），将敌围困 20 余日。与此同时，马占山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与苏炳文之东北民众救国军联合围攻齐齐哈尔，北路拉哈之战，歼敌 600 余人，西路争夺富拉尔基之战，击伤日军总指挥原加寿雄，并击毙两任代总指挥斋藤实、中岛花。

日本侵略者为对付义勇军的反抗，从 1932 年 3 月中旬

^① 《盛京时报》，1932 年 8 月 30 日。

起，便开始了频繁的“讨伐”。开始由上田支队会同天野旅团围攻敦化，铃木旅团直袭吉林救国军驻地南湖头。4月上旬，吉林救国军开展镜泊湖连环战役，直接威胁到日本侵略者在吉东的殖民统治，关东军立即从驻朝鲜第19师团中抽调一部，组成包括步、骑、炮、工兵多兵种的间岛临时派遣队，令其迅速出动，至5月初，侵入吉东敦化，宁安一带的日军近两个师团，对救国军进行频繁围攻。与此同时，日军第2师团等部亦自3月19日起对吉林自卫军发动多次进攻。4月上旬，本庄繁急从国内增调第8、第10两个师团，下旬又从上海抽调第14师团，以及从辽西调遣混成第38旅团到哈尔滨，企图“利用松花江水运进入依兰一带，消灭反吉林军的根据地”^①。本庄繁还亲自到哈尔滨指挥。由于各路义勇军多方转移，使日军疲于奔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是年8月，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对侵略军的配备作出调整，并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对付辽宁境内义勇军。10月上旬完成对辽宁民众自卫军四面包围的布署，中旬发动总攻。接着又分别对辽北义勇军第5军团以及辽南各部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义勇军自身的弱点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和有效的相互应援，加上得不到国民政府当局的粮饷接济，虽经顽强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渐次失利。辽宁境内义军大多撤退到热河省境内。

日关东军对辽宁境内几支主要义勇军的镇压取得成功后，将锋芒转向吉林，第10师团全部、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及铁路守备队等部于12月下旬分三路向穆陵、绥芬河等地吉林自卫军

^①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第47页。

发动总攻。自卫军弹尽援绝，绥芬河、梨树镇、密山等根据地相继失守。李杜于 1933 年 1 月上旬率所部 3000 余人在虎林过乌苏里江入苏境。接着，吉林国民救国军受到日军第 10 师团及间岛派遣队的严重压迫，总司令王德林委吴义成代总司令，部队化整为零，潜伏山林，王本人率 600 余人于 1933 年 1 月中旬退入苏境。

日军对黑龙江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采用诱降伎俩，未达目的，武藤遂增调三个混成旅团一个索伦支队，令其在 11 月下旬将苏炳文等部“消灭在兴安岭以东地区”^①。于是日军步骑炮兵及飞机、坦克一起出动，分四路包围。12 月上旬马占山，苏炳文由满洲里撤往苏境。郜斌山、张玉挺、邓文、李海青等部义勇军于 1933 年 1 月中旬相继撤退到热河林西、开鲁。

日军疯狂镇压东三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既是增强了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也是解除了发动新的军事侵略的后顾之忧。这些被迫退入热河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也成为参加长城抗战的一支力量。

国际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中日两国政府制定方针政策的意向，也是长城抗战爆发的重要历史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公正舆论同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政府，虽然与日本在侵华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利害关系，对日本主要奉行绥靖政策，但对日本打破西方大国战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损害他们在华利益，也

①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2 卷，第 45 页。

表现一定程度的不满，希望对日本的侵略有所遏制。一些中小国家由于担心对日本侵略野心的纵容，而造成帝国主义大国任意侵略和凌辱弱小国家的后果，对日本的侵略表示强烈谴责。

中国政府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采取了依赖国际联盟出面干预的态度，由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盟约第 11 条所授予之权力，采取最有效之方法，阻止此种情势之扩大”^①。国际联盟是 1921 年成立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有会员国 60 余个。1931 年 9 月改选的第 65 届常任理事国有英、法、德、意、日五国，中国为 9 个非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但对国联有关国际纠纷的处理能施加影响。国联理事会受理中国的申诉后，于 9 月 22 日，30 日两次作出决议，不仅无视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事实，要两国同时撤兵，且肯定日本“无领土野心”，助长了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10 月 13 日国联理事会应中国政府请求，召开第二次会议，于 24 日向行政院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日本立即开始将军队撤退至南满铁路区域以内，于 11 月 16 日前全部撤完，然后由中日双方就两国间悬案开始直接谈判。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提出以解决中日间悬案为撤兵先决条件。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时，因日本一票反对而被否决。

国联行政院于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置最迫切的日本撤兵问题于不顾，通过了由日本提议的组织调查团调查中日纠纷背景及现状的决议。这是日本企图拖延国联对中日问题的解决，并达到迫使国联承认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既成事实。1932 年 1 月 14 日，由英、法、意、美、德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成

^①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 1237 页。

立，英国李顿爵士任团长，又称李顿调查团，中日两国政府分别委派顾维钧、吉田射三郎为陪查员。调查团绕道美国于 2 月 29 日抵日本东京，3 月 14 日到上海，至 4 月 21 日方抵达沈阳。日本正是利用调查团的行动迟缓，先后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和建立伪满洲国。其间国联虽连续召开过理事会和特别大会，除 3 月 11 日的特别大会通过不承认“满洲国”的决议案比较积极外，大多是一般性辩论，而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 6 周时间的访问调查，尽管日本侵略者用虚假情况对调查团进行欺骗，又阻挠东北各界民众向调查团揭露日本侵略的真相，但还是使调查团获得了大量的真实材料。使他们得到的印象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人”^①。调查团于 9 月 4 日草成报告书，于 10 月 1 日在日内瓦发表。这份报告书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对日本的迁就和袒护，但它比较翔实地公布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是蓄谋已久的侵华事件，驳斥了日本“自卫”的谎言；“满洲国”的成立完全是日本一手泡制，若无“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员之活动，……则新国决不能成立也”；因而“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确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东三省”；认为“维持中国主权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为保持和平之必要条件”^②。由于报告书所陈事实和调查结论，主持了公道，揭露了九一八事变的实质，有利于唤起世界舆论谴责和反对日本的侵略，对中国表示同情和支持。它对“满洲国”采取不承认、不合作的明确立场，给了中国道义上和法律上的支持，因而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好评；所有人都承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 1 分册，第 437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 《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外交部译印，1932 年。

认报告书的大部分是公正合理的”^①。

报告书虽然在一些基本事实上主持了公道，但由于美英法等大国为保自身安全和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在报告书中提出了许多有损中国主权和行政完整的解决满洲问题的错误主张。它既承认日本的军事行动为非法，却又声称“恢复原状，并非解决办法”，既肯定东三省主权属中国，却又建议在满洲实行所谓“高度自治”，为“自治政府”成立一个顾问会议，须聘请“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硬说“中国人之抵制日货，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②，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办法禁止抵制日货运动，承认日本在满洲之特殊权利等等。这些建议都违背了尊重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国际关系准则，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表现了对日本侵略东北现实的迁就和帝国主义国家趁机谋私的企图。

国联在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不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就使得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强占东三省之后，敢于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而中国政府以国联在某些问题上说了些公道话，依旧把对付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干预上。由于日本发动对热河的进攻时，断然退出国联，中国政府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抵抗外来侵略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要求。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自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发表宣言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

和告全国民众书，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严励谴责蒋介石的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救国主张。1932 年 4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同日又下达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签发的《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宣言庄重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①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内的民主爱国领袖人物，无党派爱国人士及其他党派，也旗帜鲜明地表明抗日态度，反对蒋介石等人的不抵抗政策。宋庆龄于 1931 年 12 月 19 日发表著名的《宋庆龄宣言》，表示“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② 她面对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加剧白色恐怖的情况，于 1932 年 12 月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极力营救因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而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另一位国民党资深人士，远在巴黎的何香凝，通过上海申报馆发表致全国兵士民众的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悲愤填胸”，谴责国民党政府当权者的不抵抗主

^① 《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 27 页，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① 12

② 1931 12

1932

1931 11 12

③ 1931 10

,“ — ④

① 1931

②

种抗日救亡团体，并多次组织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活动，不断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全国各大中城市乃至台湾、香港的工人，发扬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积极开展反日大罢工和其他各种抗日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成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坚力量。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组织救亡团体，抵制日货，支援东北义勇军和 19 路军的抗日。其他如文化教育界、妇女界、宗教界以及海外华侨，无不痛感已到“我国家民族生死关头”；如不自筹自救，则栋折榱崩之惨祸，讵能幸免”，而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这股抗日救亡浪潮，由沿海波及内地，推向西南和西北边疆，就连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亦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息内争，御外侮，愿本阅墙御侮之义，同仇敌忾，为国努力”^①。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所及，也就为反抗日本发动新侵略的长城抗战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也使得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和对日方针发生某些变化。国民党本来就充满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为全力进行反共内战，独揽党政军大权，就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1931 年 2 月，蒋介石将与自己政见不同的立法院长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引起反蒋的中央执监委员纷纷南下广州，联合粤系、桂系，打起“护党救国”的旗帜，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蒋调兵进剿，爆发宁粤战争。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外敌入侵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严厉谴责不抵抗政策的形势下，而不得不暂时息争，于

^① 《云南滇京边区会议主席格桑译仁等致国民政府电》，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1年10月由汪精卫代表粤系，在上海与蒋介石召开团结会议。同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上，蒋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及海陆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12月下旬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与粤系胡汉民、汪精卫同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后表面上佯称：“日以读书写字为生活，报纸久不寓目，亦鲜谈及时事”^①，暗中却对新内阁釜底抽薪，力求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满足已取得的地位，四届一中全会后称病住进上海医院，冷眼旁观孙科等人的动向。孙科面对对日方针等棘手问题，由新任外长陈友仁拟定了一份外交计划，提出“消灭战祸，保护主权，并于最短期间务达恢复失地之目的”^②。接着又联合两广势力提出对日绝交计划。尽管他解释“对日绝交并非对日开战，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③这也不能为蒋介石、汪精卫所赞同。蒋于1月11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上演讲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于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之内悉为敌人所蹂躏。”^④1月17日，蒋汪在杭州会晤，密商共同反对孙科的对日政策，达成默契后将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等接到杭州会谈，对孙科施加压力。蒋露骨地说：“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对血气，孤注一掷，国必灭亡。”^⑤在蒋汪等人的攻

① 《申报》1932年1月11日。

② 《申报》1932年1月8日。

③ 《申报》1932年1月17日。

④ 《时事新报》1932年1月21日。

⑤ 《申报》1932年1月18日。

击下，孙科内阁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倒台了，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罗文干接任外交部长。蒋介石入官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负责军事，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这时，日本侵略者发动一二八事变，蒋汪推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由来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在上海举行团结会议时确定的，其内容包括：（一）竭力从外交方面活动，以防制日本侵略之扩大；（二）日本军队无论向中国何处侵扰，守土军队应实行正当防卫，但不必宣战；（三）设法进行收复东三省失地^①。汪精卫解释说：“我们所持的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因为中国的国难，并非偶然，故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②应当说，这一方针比起九一八事变时的“不予抵抗”来说，有了某些变化，它毕竟有了抵抗的成分，这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武装抗日，严励谴责国民党当局对日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形势所逼，所以当一二八事变发生后，19路军已自发地奋起抵抗，蒋汪也不能将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送掉，也就采取了增调部队参加抗战的行动，并发表一些抵抗的言辞。蒋介石在1月30日《告全国将士电》中宣称“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③但是，他们的抵抗和交涉都是作为一种手段，就在蒋声言抵抗的同

① 蒋永敬：《九一八事变后的热河防守问题》，台北《中外杂志》第52卷第5期。

② 同上文。

③ 《申报》1932年1月30日

时，暗地里操纵宋子文、何应钦等人谋求妥协。经他与汪精卫密商后，2月6日何应钦两次密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要他探询英美的态度，希望英美“设法转圜停战”^①，并要宋子文、张静江、张群、孔祥熙等人与在沪各外交委员会委员商量，“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②。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在蒋汪等人的妥协退让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蒋汪推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其目的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抵抗和交涉都是为了取得一个暂时和缓的外部环境，以利反共内战的进行。上海停战后，蒋介石就立即发动了对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他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开始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红军根据地的进攻，同时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及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10月，蒋介石结束对鄂豫皖、湘鄂西的“围剿”后，立即把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12月，何应钦调集30多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这既证明了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服从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也表明长城抗战是在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共内战的形势下发生的。

蒋汪等人继续推行对内反共，对外妥协的政策，使国民党内部分进一步出现分化，除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有威望的上层人士始终坚持抗日，反对妥协的立场外，其他许多中央委员陆续

① 《何应钦致吴铁城密电》（1932年2月6日，2月8日），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 同上。